

总主编 周治滨 郭伟
本卷主编 周和风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发展史论

哲学卷

MAKESIZHUYI
ZHONGGUOHUAFAZHAN
SHILUN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总主编 周治滨 郭伟
本卷主编 周和风

中国化发展史论
马克思主义

哲学卷

MAKESIZHUYI
ZHONGGUOHUAFAZHAN
SHILUN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论·第2卷,哲学卷/周治滨,郭伟主编;周和风分卷主编.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9. 9

ISBN 978-7-5035-4188-9

I. 马… II. ①周…②郭…③周…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国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中国 IV. 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5120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三河丰华装订厂装订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1

字数:2346 千字

总定价:260.00 元 (全五卷)

责任编辑 武 帅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马 晶
责任印制 张志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论第二卷

哲 学 卷

主编：周和风

本卷作者

李景源	引 论
陈名财	第一章至第四章
周和风	第五章至第九章
曾繁亮	第十章至第十三章

目 录

引 论 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开创新世纪中国 哲学新境界	李景源(1)
一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	(1)
二 唯物史观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13)

上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性问题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	(29)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是视界融合	(29)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特征的融合	(35)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践要求的融合	(39)
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	(41)
五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等优秀 哲学资源的融合	(48)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必要	(57)
一 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的不竭源泉	(58)
二 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世界观和 方法论	(62)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契合中国传统哲学走向现代的内在 诉求	(72)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	(78)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世价值使其在中国本土化得以 可能	(79)
二 中西社会发展的异质同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得 以可能奠定了现实基础	(89)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和差异使两者的 深度融合成为可能	(96)

四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得以实现的保证	(103)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趋势	(113)
一 从指导革命到指导建设	(114)
二 从关注中国到关注世界	(117)
三 凸显时代特征和“中国经验”	(121)
四 从结合到创新	(126)

中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

第五章 近代中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35)
一 近代中国的国情	(135)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138)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	(147)
第六章 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53)
一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辩证结合	(153)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中的初步运用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	(156)
三 《反对本本主义》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163)
四 《实践论》、《矛盾论》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	(169)
五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	(187)
六 基本的经验	(205)
第七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212)
一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212)
二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	(226)
三 基本的经验	(245)
第八章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253)
一 马克思主义改革哲学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253)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创造性运用	(269)

三 基本的经验	(282)
第九章 新时期中国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285)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285)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	(294)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302)
四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意蕴	(308)
五 从科学发展观的确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机制	(318)

下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成果

第十章 毛泽东哲学思想	(325)
一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基本特色	(325)
二 实事求是论	(328)
三 实践论	(333)
四 矛盾论	(338)
五 群众主体论	(347)
第十一章 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	(356)
一 邓小平理论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356)
二 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观基础	(357)
三 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观视角	(364)
四 邓小平理论的方法论特色	(383)
第十二章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	(396)
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贡献	(396)
二 与时俱进论	(398)
三 政治文明论	(403)
四 先进文化论	(419)
第十三章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432)
一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和最新理论成果	(432)

-
- 二 科学发展的自然观基础：人与自然关系再认识 (444)
 - 三 科学发展的社会观基础：人与人关系再认识 (452)
 - 四 科学发展的和谐观基础：效率公平再认识 (458)
 - 五 科学发展的人本观基础：发展目的再认识 (472)

引论 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开创新世纪中国哲学新境界

李景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理解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深入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和经验、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要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首先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其次要从研究范式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深度思考。

一、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以往由于学科划分、人员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着框架陈旧、领域狭小、线索单一等问题。其结果，一是导致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错误的理解。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是辩证唯物主义论者，以此来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妥的。这也说明了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紧迫性、必要性。二是研究成果老套、干瘪，缺乏历史感和可读性。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有所创新，必须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我们可以借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提出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即弄清楚所研究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毛泽东把这种方法称为“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根据这一方法，要研究某个问题，就要把它放在具体时空中，放在与之相关的历史关系整体中来把握它的形成和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要采取这种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首先，要把史与论结合起来；其次，在史的研究中，要把哲学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结合起来；再次，要做到上述两点，必须在

研究范式上把“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史范式”结合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把握，缺乏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全面了解，缺乏本土文化的素养，是很难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在我看来，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深入扎实地开展下去，取得创新性、突破性成果，首先要明确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一）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是中华民族主体长期探索的结晶

马克思认为，一个哲学体系的内容因历史的需要而形成，以本国过去的整个思想发展为基础。唯物史观的引进，是中华民族主体长期探索的结果，清末的史学革命为唯物史观的传入揭开了序幕。19世纪末由严复、梁启超掀起的史学革命是历史观的革命，它为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前提。此后，围绕历史观的两大基本问题（是思想观念还是现实利益，是人民大众还是英雄豪杰，两者之中究竟哪一方面更具有历史意义？）的争论，其影响长达近一个世纪。

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历史主体是中华民族，不是个体主体。当时展现出来的天崩地裂、亡国灭种的民族境遇，促成了中国人接纳西方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的学习，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这样一个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期，恰恰是中国处于思想变革的时代。当时，“革命”一词成为报纸刊物中最核心的字眼。最先提出的是文学革命、诗学革命，后来逐渐转入了史学革命。中日甲午之战的失利，使严复痛下决心，连续翻译了八部西方著作，第一部就是《天演论》。他很明确地提出君主实际上是窃国大盗，社会和国家真正的主人是国民，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说”。揭开史学革命序幕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的学问。他提出西方的史学是民史，中国的史学是君史，一部中国历史实际上只是二十四姓的家谱。他给历史下的定义是全体国民生产生活的总和，二十四姓家谱显然不能说是代表中国整个历史进程，他提出了去君史、写民史、申民权的主张。严复也批评中国的历史论述“于帝王将相之举动，虽小而必书；于国民生计风俗之所关，虽大而不录”^①，国家的“强弱盛衰，至为难知”。据此，梁启超又提出了“少年中国说”。他提出过去只知有君，不知有民，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观念是不存在的。自从引进西学之后，特别是民主

① [英] 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政治的不断发展, 逐步形成了国家的概念、社会的概念、国民的概念。由此, 中国进入了“少年中国”阶段。在此之后, 蔡元培、李大钊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可以说, 梁启超提出的史学革命就是历史观的革命。他认为历史作为研究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的学科, 在救亡图存的情势下, 已成为最重要的学科, “史界革命不起, 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围绕史学革命的争论实际上影响了中国近一个世纪。史学界争论的基本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观念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关系。思想观念与社会基础结构哪个更具有历史意义。洋务运动是从器物入手改革, 但是事实证明器物改革不行, 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都失败了, 后来就把目光转向了制度改革。戊戌变法的制度改革也失败了, 最后就追溯到思想。早期启蒙者把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这一认识过程本体论化, 进而提出了心力说, 认为精神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并进一步提出宗教救国论、佛教救国论。很显然, 这是一种存在论上的观念论, 其实质是把主观性作为历史哲学的最高原则, 是支配中国数千年的内圣外王传统的变种。这种内在论的思路虽然包含有合理的成分, 但它并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根本所在, 因而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文化保守主义从观念论出发, 把西学东渐和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归纳为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 又回到了起点, 对中国问题的认知始终未能冲破观念覆盖物层面而直达社会的基础构造。当时李大钊等人对此运用唯物史观进行了批评。他说: “唯物史观就站出来反抗那些历史家和历史哲学家, 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社会构造, 都列于第二的次序; 而那些被历史学家藐视的, 对于研究社会生活有莫大的价值。”1902年,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 认为民生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才从观念论过渡到民生论, 为社会改造论的提出提供了中介环节。从心力说到社会改造论, 从思想革命到社会革命, 这个转变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完成的。当时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既参与其间, 同时也受益于整个讨论。

另一方面是英雄、精英与民众的关系, 即人民群众与少数英雄人物的业绩相比, 哪个方面更具有历史意义。这个转变也是非常明显的。现在政治哲学讨得比较多, 实际上中国的政治哲学讨论起源于19世纪后半叶, 从君主立宪到民主立宪的转型, 从旧民主到新民主的转型, 讨论非常激烈。20世纪初, 从梁启超的“民史论”和“新民说”(西方的史学是“民史”, 中国的史学为“君史”, “一国之强弱废兴, 全系于国民”、“吾祖国前途有一大问题: 曰中国群治”)到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和“三民主义”(“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从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此后的

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到李大钊的“群众时代、劳农主义和唯民主义”（“唯民主义是宪政之本，英雄主义是专制之源”）；从陈独秀的“我们所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到毛泽东把“民众的大联合”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这条主线是非常清晰的。这个转变是历史观的转变，也是理想人格的转变。梁启超曾经提出“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非常明显地反映出历史观的转变。

（二）长期系统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源泉

长期的、系统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源泉。所谓系统的社会实践既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也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既包括工人运动的实践，也包括农民运动的实践；既包括成功的实践，也包括失败的实践。每一次大规模的实践探索，不管成功与否，都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传播及其中国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使人们的认识由改良转向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人们的认识由朝廷革命转向国民革命；大革命的失败，使人们的认识进一步由国民革命转向农民革命。就群众史观的确立而言，每一次社会实践都使人们的认识向唯物史观前进一步。

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起源过程不应仅从五四运动开始，而应该从戊戌变法开始。戊戌变法失败了，它留给人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改良是不行的，应该要革命。梁启超是一个重要的中间人物。梁启超于1896年办了《时务报》，鼓吹革命，并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招收四十几个学员，这些学员后来很多都是辛亥革命和民主革命的成员。在时务学堂期间，学员们的作业基本都是在鼓吹推翻清王朝，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当1898年戊戌变法时，连君主立宪的字眼都未出现，目的是为了不惹恼当权者，而是靠改良本身的逻辑来促进事情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不行，光绪帝对严复明确地说，你们那一套我基本了解，但是有一条基本原则，朕的权力一点都不能少。1898年的戊戌变法并未涉及清王朝的统治，但仍然被扑灭了。按照告别革命的理论，以为只要按照变法的道路发展，中国就能强盛起来、发展起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又失败了。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是要从朝廷革命转变到国民革命。辛亥革命中，几个省一宣布独立，朝廷就垮掉了，但是整个社会关系没有任何改变，这样才有以后的袁世凯、张勋复辟。教训是必须进行国民革命，而不是进行朝廷革命。毛泽东对两次革命也有自己的总结。在驱张运动失败后，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现在政治界暮气已深，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必须从根本上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选择新的道路。在当时并存着三种形式的社会实践：

上层有改良, 中层有革命, 下层有民变。辛亥革命失败后, 毛泽东评论说, 中国社会需要一个大的社会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 所以失败了。所谓大的社会变动, 就是整个社会结构关系的整体性改造。谁能实现这个改造, 谁就能站在历史的潮头, 获得历史的主动权。下层民变对毛泽东触动也非常大。毛泽东于1965年上井冈山时, 还提及到平浏陵起义和彭铁将起义。这三种不同形式的实践对毛泽东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平浏陵起义对秋收起义、北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举行秋收起义, 挺进井冈山实际上是在几种改造社会的不同形式的实践中比较的结果。

辛亥革命失败后, 孙中山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 由旧三民主义转向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实质就是扶助农工, 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观。他在民生主义中明确指出, 民生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是民生, 民到底在哪儿呢? 他在新三民主义中提出扶助农工。但是当时这在国民党是行不通的。在国共合作期间, 国民党一大时, 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斗争极其激烈。右派说, 如果发表这个宣言, 我们国民党就会垮台, 因为我们的基础是地方实力派、华侨, 如果提出扶助农工, 我们的基础就被挖掉了。无奈孙中山找到鲍罗廷商议。鲍罗廷提出了国民革命的三个支柱: 工人、农民、小商人。但是在实际的运动中, 工人、农民、小商人都是反对国民党的。在前线, 鲍罗廷了解到士兵如潮水般后撤的原因。士兵们说, 我们打仗, 小商人反对我们, 工人不理我们, 农民干脆不给我们饭吃。我们只能撤退。鲍罗廷指出国民党应该说是领导民主革命胜利的政党, 有三个支柱即工人、农民、小商人, 但是这三部分人都反对国民党, 原因就是国民党从来不给这些人以利益。因此, 国民党成了悬在空中的党, 是不可能胜利的。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 要解决农民问题, 颁布土地法; 第二, 要解决工人的工作制问题, 颁布劳动法; 第三, 要团结资产阶级中下层。由此孙中山才痛下决心, 鼓足勇气在大会上反复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到了从神权到君权, 由君权到民权的时代, 但是我们以往的做法, 只相信兵力, 不相信心力(即民心, 百姓的支持), 所以胜败无常。如果我们把兵力置于心力基础之上, 有了百姓支持我们就会不断取得胜利, 既不怕张勋, 也不怕袁世凯。由此孙中山下决心成立了农民部, 邓演达任部长。一方面抓兵力, 成立了黄埔军校, 另一方面培训农民, 在广东办了七期讲习班, 前五期都是培养广东农民运动领袖, 这样在广东站住了脚。

毛泽东先是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 后来又组织了新民学会。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让他填写一个表格, 填写经历和打算, 他写道, 我教过一年书, 做过两年工人运动, 半年农民运动, 一年国民党组织工作(曾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 现在研究社会科学, 注意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中共

“四大”以后，他在党内任农委书记，主持了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在讲习所讲了23学时的国民运动与农民问题。此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变化。

毛泽东的立场始终立足于中国实际。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是组织者，但是他本人没有去。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一个理念，我们如果改造中国，就要立足于中国这个地盘，把中国的实际彻底搞清楚。此后他在农村搞了十几个社会调查。恰恰是这样一种系统的社会实践，使其对中国革命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如果说在搞民众的大联合的时候，还提倡呼声革命，到后来转变为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通过不断地社会实践探索，他知道了中国的民众在农村。1956年他讲过，我们一开始搞革命总是失败，就是因为我们平面地看农村，后来有了唯物史观，我们才知道立体地看农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农村，革命才搞成功的。后来他与斯诺谈话总结了五句话：得农民者得天下；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得到了农民；谁得到了农民，谁就得到了中国。如果说历史观从君主到国民，从国民到农民这样一个脉络，这个脉络恰恰展示了中国革命的由不自觉到日益自觉、日益明确的过程。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的整个民主革命过程可以说了然于心。这与他的长期革命实践是分不开的。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成功，陈独秀、王明在什么地方跌倒，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农民问题。“四一二”政变，蒋介石仅仅整合了社会的上层，而当时中国的革命任务必须整合中国的下层。恰恰是唯物史观，或者说整个民族探索的群众史观，使毛泽东走了一条从下层进行整合的途径。这条道路最终保证了中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三）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本途径

以现实问题为中心带动基本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模式。为了解决党内的教条主义和国内不同政治派别关于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毛泽东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进行了艰苦的哲学研究和思考，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的哲学著作，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精髓等重要思想，对国内思想界的共相论（如主张理在事先的观点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和特殊论（如主张唯物史观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种种中国特殊论）进行了哲学的清算。

毛泽东到达延安之后，基本是在进行理论准备。这时许多马克思主义

著作已经翻译过来，他阅读了当时几乎全部的著作。毛泽东的理论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现实问题研究作为理解前提来看这些理论问题，因此吸收和理解起来非常之快。他的针对性一方面是党内的教条主义，一方面是国内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争论，总起来说是特殊论与共相论的争论。特殊论者如梁漱溟、戴季陶、叶青等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中国具有指导意义。针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他们提出中国没有阶级，只有大贫和小贫、有产和无产的问题。叶青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地域性存在，马克思主义是特殊，中国也是一个特殊，不能用特殊来指导特殊。梁漱溟到延安后与毛泽东辩论了八次。后来他对此有许多反省，他说是实践使他心悦诚服。梁漱溟的实践是很深入的，搞了多年的乡村运动。他说，我搞了数年乡村运动但是乡村不动。戴季陶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蒋介石也非常重视理论研究，解放后他书桌上摆着毛泽东的书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另外一派是学院派，如冯友兰、贺麟先生，主张共相论。贺先生有《文化的体和用》，冯先生有《别共殊》。但是这两派都割裂了殊项与共项的关系。张岱年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写了《谈理》，批判冯先生的“理在事外”，提出“理在事中”。毛泽东提出“共性与个性的问题是辩证法的精髓”，是认识改造中国问题的精髓。这不是随意地写出的学院派的东西，非常有针对性，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口号，那么就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指导之后要不要像王明一样一遇到问题就拿本本来，理论要不要跟实际、跟实践相结合，所以毛泽东才写了两论。学院派的内容也具有认知上的意义，但是不能解决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

邓小平晚年的最大贡献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党长期探索的结晶。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问题，1974年他提出找一些人研究为什么非洲的社会主义发展不起来。1980年，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非洲的社会主义越搞越穷，开始深入思考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此之前邓小平在思想上基本搞清楚了这些问题。1975年他在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的时候，就提出人类发展靠什么，如果靠经济发展，那么发展经济是不是唯生产力论。如果经济和生产力是推动社会的动力，那么推动生产力的是什么，要不要多劳多得，要不要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要不要进行限制？他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是以经济建设为纲。毛泽东实际上是反对的，他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还是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否定了邓小平的提议。后来姚文元批示说邓小平还是唯生产力论。这一场斗争实际上是历史观的斗争。1977年8月邓小平复出，马上就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批准了